

宁应斌：暂停女性主义

现在时间有点晚了，我就讲的简短些，大致勾勒一下我们共同的一些想法。大概今天很多人是冲着“女性主义”这四个字而来的，大家想听我们几个人谈女性主义，但是从以上几位的讲话，大家发现好像我们是在挑战女性主义。这也没错，我们是在反思女性主义。我们标举的是性/别，也就是传统的“性别”中间多一条斜线，性别当然是女性主义的主题，但是加一条斜线以后呢，又多了一个性字，所以是在性别里面强调性的差异（差异就是“别”）。其实在英文里面也有这种用法，也就是所谓的 Gender/Sexuality，这种用法的出现反映了性别跟性的关系很密切、很辩证，所以连在一起、但又区分。

让我稍微回溯一下性别跟性之间的运动历史与中国的关联吧。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女性主义运动或妇女运动，在西方社会 19 世纪末期开始到 20 世纪初有过第一波运动，这波妇运后来是以妇女投票权这样的自由主义路线与诉求成功而告终的。但是之中也有社会主义的路线，例如恩格斯其实便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前驱；共产党里面都有个妇女支部。今天中国大陆对于女性问题的许多提法，其实是受到第一波妇运中进步路线的影响，像“妇女可以撑起半边天”，或是“新婚姻法”等等，都是受第一波妇运影响后的产物。

西方第二波的妇女运动则发生于 1960 与 1970 年代，这个运动和西方反越战与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分不开。但是第二波妇运却比较没有在 1960 到 1970 年代时进入中国大陆，虽然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的这些运动有点推波助澜，很多地方看得到小红书或毛主席的像，有些人标榜，也有些人批判毛泽东思想，不过西方的这些运动思想（包括第二波妇运的女性主义）在当时却没有反过来进入中国大陆。

比较少为人所知的，在西方，性的方面也有两波运动。第一波性运动如果追溯到生育控制这些性科学实践，其萌芽也是 19 世纪末，但是充分具有性政治意义的性运动则差不多是在第一波妇运的尾端与之后一段时间。第一波性运动中有像 Reich 这种“左派”激进的路线，也有主流改革路线的，当

然还有更温和的路线。第一波性运动中的主流路线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性改革联盟,英文叫做:World League of Sexual Reform,领导者就是 Magnus Hirschfeld。后来因为纳粹的兴起而被消灭掉,书烧了、机构也拆了。

这个第一波性运动也曾影响到中国。今天中国人讲的性是科学的、性是美好的、还有科学的性教育、什么性健康(包括用“成人保健”的名义来卖性用品)等等这一套东西,其实都是第一波运动的残留,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你们活在一个跟第一波性/别运动没有关系的世界里。不过中国只接收了第一波性运动中比较保守或温和的部分,第一波性运动主流路线所强调的平反同性恋,却没有在中国出现。

西方的第二波的性运动,例如同性恋解放运动,是紧跟着西方的第二波性别解放运动。第二波性运动也比较没有进入中国大陆,这和第二波性别运动一样。

就整个第三世界来讲,现在仍有很多地区的妇女还没有基本的平等权利,在法律上与各方面的社会权都受到歧视。在这些地区,当地的某些女性主义者确实对西方的女性主义非常欢迎,用来批判自己社会中的男性特权或宗教压迫;但是也有一些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的普世主义,而要调和与自己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女性权益,或者强调下层妇女与反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结。在这些社会里,除了艾滋病、性暴力与生育议题外,有的几乎完全没有性运动话语,没有同性恋运动。有的地区像印度则还有性工作的性运动议题。

在西方与一些非西方的地区或社会,女性与男性大致上已经在法律政治等领域取得平等,女性主义中基本的男女平等话语已经是社会的主流话语,具有“政治正确”的地位。当然这不见得表示说这些社会里的男女真的在各方面都实质地平等了,但是在这些社会里,主流的妇女运动获取了一些上层的有利位置。台湾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在中国大陆,我刚刚说曾经受到第一波性/别运动的影响,但是过去并没有受到第二波性/别运动的影响,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西方的第二波妇运思想开始在大陆文化知识圈流传开来,至于西方第二波性运的思想可能还没有在大陆的文化知识圈流传,不过近年来则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小圈子中开始吸收与挪用。

那么今天我们这几个台湾人在中国大陆,以性/别的角度视野来反思女性主义,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性这个东西?我今天的题目

叫做“暂停女性主义”，这个提法不是我的发明，因为自从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到了1990年代，女性主义的一些问题慢慢跑出来了，刚刚前面几位都有讲。一些对于女性主义的反省，有时是用后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或是反种族歧视的女性主义这类思潮表现出来，甚至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诸多流派里面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持续对主流的基进女性主义有所批判与反思，影响深远。（我这里要补一句以免大家误会，所谓基进女性主义不是形容其态度激进，而是说它以性别为其唯一的分析立足点，其他的分析角度像阶级、族群、性等等等都不被它认为是最基本或根本的。）

不过，在台湾的我们并不是受到西方后女性主义这些东西的影响因而展开对女性主义的反思。我们其实就是土生土长的，自己在台湾的妇女运动发展中、遭遇中开始觉悟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呢，我们忽然发现西方有些人稍早或同时也在思考同样类似的东西。换句话说，主流女性主义本身有些问题的存在，是一个普世的问题，不是只在台湾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中国大陆，你们迟早也会走到这个地步，你们有一天会想起来：“有些女性主义的问题好像几年前曾听过台湾人讲过。”那就太晚了。所以现在就要开始来好好批评，多多反思。

在今天很多的地区，女性主义或妇女运动已经进入了治理的层次。治理，有人叫做协同治理，也有人叫做共治或民主共治。这是什么意思呢？“统治”在过去就是国家独掌的职能，像共产党掌握国家的权力，有个中央政府在统治你；这就是统治。那什么是治理（共治或协同治理）呢？就是说“统治”这个东西它有一部分权力分出来了，分给谁呢？分给一些民间的或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些人、一些团体或机构，这些团体或机构的性质可能很多样，有些是NGO，有些是半官半民的，有些是立法或者政策的咨询或监督的个人或委员会等等。这些参与治理的人或团体，他们实际有了部分或局部的统治权力，其权力有时看似很小（比起公部门或长官权力），有时甚至没有可见度，但是却可能影响许多人在某个层面的日常生活或身体与自我。

这种治理透过很多不同的途径，其中有的是软权力。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治理优于传统的统治。譬如说，国家公部门有些事情做不好，其统治权力到达不了某些人身上，没办法推广某些政策，国家接触不到某些人群，所以国家公部门就把一些项目计划交给某些民间团体去做，这些团体可以接触某些人群或有效落实某些政策。也有些时候，公部门成立一些咨询委员会，来协助立法或监督，或者落实或监督某些政策方向，当然有些谘商委员

会形同虚设,只是替公部门背书或给予正当性,或者委员会中有些谘商委员毫无力量,有些委员则主导一切。还有一些机构是半官半民,做官方的白手套,或由国家帮忙成立的民间团体,这往往是因为某些领域或范畴要交给民间自治,国家的管制则只是程序部分,而非实体,像金融、股票这类领域。换句话说,国家把某些领域开放民营,或者国营变成私营,虽然说是开始了民间自治,但是国家还有某些管制,此时往往会采取各种治理形式。

像治理这样的情形普遍地发生在很多国家里面,中国大陆也开始有这样的势头。在各国的治理状态中,女性主义或妇运也参与了治理,而且有时影响深远,美国有位女性主义者就指出了这点。我今天的题目,“暂停女性主义”,就是来自这位女性主义者,她的名字叫做 Janet Halley,是位法学家,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她以前写的一篇文章,收录在我们性/别研究室出版的《性骚扰、性侵害之性解放》一书里面,是我们的老朋友。她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做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Take a break”的一个意思就是大家累了、休息一下。但是 Break From Feminism 有另外一个意思, break from 讲得严重点就是我跟你割袍断义,我跟你分裂。所以她这个书的副标题是一语双关。

Janet Halley 是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但是为什么她或一些人在搞这个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我把它转译成“暂停女性主义”。暂时要停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 Halley 就发现,在今天很多地区与国家(也许不是中国大陆),在中央政府里,在教室里,在各个机构里,在街头,甚至在很多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里,其实女性主义的权力已经进来了,已经参与治理了,已经在统治大家了。就如同何春蕤讲的这个网络,你家计算机属于很私密的空间,你回到家里,把卧室门关起来,网络一打开,看着一大堆色情的东西,你就开始手淫了,这多私密啊!可是你却没有想到说,其实在遥远的某处,可能在过去某几年的时间里,有少数女性主义者已经决定了你此刻在网络上的命运,她们决定了你在网络上不能写什么,你不能看到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的命运已经就在那儿被人决定了,这个治理的影响很大。

这个女性主义的治理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很多方面。比如就性骚扰立法来讲,性骚扰立法的原始用意是处理不平等权力下的性别关系,例如我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员工,或者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或者我是你的上级长官、你是我的下属,我们两个的权力不平等,而我们是一男一女,男方占据权力优势,在这个权力不平等的性别关系里面,男方如果利用其优势的权

力来对女方做性方面的进犯,这就叫做性骚扰。

可是在台湾,现在性骚扰立法却已经改变了原意,扩充到双方没有任何权力不平等关系,扩及不涉及肢体的性侵犯,甚至扩及没有面对面的情境(如透过网络),而且有时还偏重女方的“主观感受”来界定性骚扰。比如说,男女同学或同事之间,两个人的权力是平等的,应该可以平等互动,但是女的还是控诉被性骚扰,甚至就算女的是上司,也会宣称被男下属性骚扰。路人甲在公共场所,对路人乙说“小姐你长的好漂亮”,或者凝视等等,这也可能变成性骚扰立法惩罚的对象。同事之间开个黄腔或搭个肩膀,现在也可以指控是性骚扰(实际上能否入罪判刑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这些情况竟然可以提告,就已经形成某种社会氛围了)。你可能认为这些确实就是性骚扰,或许如此,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立法来惩罚,那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表意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如果路上或者网络上有一人你不认得,他也不是你老板、他也不是你老师,他跟你说你很漂亮,你不高兴,你觉得他骚扰你,你不理他就得了,或者你离开那里,或者骂他一顿。可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法律说可能可以把这个人抓起来,这就表示女性主义的治理已经到了一个深入与侵害很多方面的程度,它已经借着国家在规训我们的生活或性。

女性主义的治理或协同共治在许多国家已经是常态。Janet Halley 就说,从白宫到个人自我的治理,都看到女性主义正在分享统治权力中。现在很多妇女学程的女学生毕业后第一志愿就是进入某个 NGO,也就是进入治理或协同共治。但是女性主义的治理后果在许多状况下是不必交代的,就是没有究责的(accountable),换句话说,治理所带来的一些恶果找不到人负责。何春蕤举的台湾网络文字狱例子虽然造成很多人的痛苦,也折损了言论自由,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究责。女性主义有治理但免于究责,这也成了一个相当普世的现象。这种有恶果、又没有究责的治理,可以说是恶治(bad governance),而不是善治(good governance)。

如果要归结主流女性主义的恶治和其思想本身的关联,那么我们可以说(正如 Halley 和很多人都指出的),就是主流女性主义假设了女性都是受害的,女性都是无辜的,而男性都是免于压迫或不会受伤害的。这些单向的假设决定了女性主义的治理方向:通常是尽一切方式或不择手段地保护或甚至预防女人免于受害(保护与预防成为基调),这些保护与预防的手段往往会侵害人权或自由。然而,既然目的是为了保护无辜的受害者,当然也免

于究责。恶治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于主流女性主义这样的发展,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女性主义内部向来就有不同路线,Janet Halley 认为有统合的女性主义(Convergentist feminist)就是将女性主义路线的各种冲突尽量都调和融合到女性主义框架内,还有决裂的路线(divergentist)则和主流女性主义分道扬镳,例如后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已成过去。Halley 的“暂停女性主义”则是一个比较折衷的路线,只是暂停和休息,在女性主义之外流连探索。

为什么要暂停女性主义?为什么要女性主义之外流连探索?因为很多新的利益与新的群众不是女性主义能顾到的,有很多问题是现在女性主义处理不了的。为什么处理不了?比如说前面何春蕤提过的跨性别吧,女性主义总是说性别是两个阶层,男人是拥有特权的上层,压迫位居性别体制下层的女人,而且男女各有本质,女性的特质像关怀等等还是比较好的。可是遇到跨性别主体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女性主义拥抱女性的本质特点,确认男女的性别差异,换句话说,她是肯认这个性别体制的性别分野的。跨性别的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男变女或女变男,看似在复制性别阶层的本质(例如许多男变女都宣称自己是想要做“真正的”女人),但是却把这个二分体制搞得晕头转向(例如性别二分体制很难容纳两个男变女之间的女同性恋关系),当然这也使得跨性别不断受到质疑和排挤。从这个角度来说,性别体制其实是三个阶层,男、女、跨性别,而女性作为性别体制里面的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她对于性别解放的愿望跟愿景是不会够彻底的(radical),她不会要把性别的体制彻底打破,因为她虽然在性别体制中被男性压迫,却也在性别体制中得到完整自我(本质认同)。反而是跨性别的存在就不断挑衅性别体制的二分法则;这是女性主义的性别观不容易解释的。(人们认为跨性别只是在复制性别本质,因为有时跨性别就是要做真正的男或女,但是本质是不能被复制的,复制这个实践本身就说明了其实性别没有本质存在,跨性别所作的只是引用与操演,因为跨性别引用了某些性别特质,操演了惯常的性别表现,所以就变成男或女了。那么,一般所谓的男女其实也一样靠着引用与操演才有性别,而不是具有什么本质。跨性别因此凸显了性别的操演性。这是 Judith Butler 所指出的。)

男女两性的性别之分,其实里面已经隐含了异性恋的系统,因为所谓男女两性的二分说法不只是说男的有雄性性器官,女的有雌性性器官,而是说男的性要欲望女,女的性要欲望男,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性别的男女。同性恋

因此是“性别”无法单独处理的问题。所以只建立在性别之上的女性主义在处理同性恋与跨性别的问题上本身就有局限性。

女性主义也不能够处理 SM 的问题,SM 一般被当作性虐待,李银河称为虐恋(李银河是少数将第二波性运思想引进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台湾叫做愉虐(恋)。女性主义认为 SM 或 SM 色情中既然是男人虐待女人,那么这就是暴力或性暴力,不能因为女人接受或享受被男人虐待就容许 SM,因为女性主义认为不能接受 SM 这种“女人自愿受虐”的逻辑——否则就会接受“女人自愿被压迫、被支配”,这样一来,只要女人自愿接受男人的压迫与支配,那么男人父权的压迫与支配就有了合理性。所以就女性主义的性别观点而言,接受或享受 SM 受虐的女人都是被洗脑的、内化奴性的女人,就像某些被男性父权洗脑的女人,甘愿接受男性支配一样。

同样的,女性主义不太能处理性工作,不太能处理色情,不太能够处理女同性恋里面的 T 婆(TP)之分,甚至连减肥瘦身也没办法很好地处理。这些我们在台湾都有过论述,也出版了一些书和文章(例如我编著的《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就有写到女性主义关于减肥瘦身的标准答案错在哪里。我与何春蕤合编的《色情无价》则处理了色情问题。我们还出版了几本关于性工作的书)。

此外,女性主义对于那些可能会改变人伦关系、改变家庭婚姻、改变性、改变身体的新兴偏差行为与新兴科技都感到很害怕。譬如说人工生殖的科技或代理孕母的问题,很多同性恋与跨性别听到这些科技或实践都觉得是好事,但是女性主义则通常站在反对立场。在这些议题里,女性主义通常都站在比较保守的立场,在女性主义的想象里面,她都还是个受害者,男性则都是加害者。但是女性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其实女性本身也有侵略进犯的倾向,也有对权力进取的欲望(也就是要掌握权力),同时很多女性也会被女性主义的某些作为所伤害。女性不总是那么无辜,男性也可能受害。可是这些都是在女性主义的话语里面比较听不到的面向。

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由,我们开始听到西方有一些人要跟女性主义决裂。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地方不应该和女性主义决裂(divergentist 路线),因为大陆的性别处境在许多地方仍需要女性主义;可是又没办法采取统合路线(convergentist),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女性主义就是没办法把某些议题融合到女性主义框架内。所以现在比较折衷的方法就是刚刚讲的,在涉及性、身体、族群(文化、殖民)、阶级、年龄的许多议题上,不要用一个本

质化的性别来分析理解,也就是要“暂停女性主义”。

暂停女性主义就是说:可以保留女性主义,世界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仍然有价值;但是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她看不到,有些问题她掌握不了,有些问题她的思想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暂停一下,我们要在女性主义的范围之外赶快去看一看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说法、新的现象或问题,有没有新的眼界去理解女性主义。